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

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对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程序以及设定行政强制的论证、评估等作出进一步修改和规定。

行政强制法是继1996年出台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出台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立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将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履职、保护公民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行政强制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它既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扣押财物、冻结存款等行政强制措施,也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比如,强制查封企业仓

库,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等。目前,我国的行政强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专家概括为“软”和“乱”。“软”是说由于强制手段不足,执行力弱,一些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乱”主要是指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混乱、执行主体混乱,导致行政强制种类繁多,各种名目的执行队伍日渐庞大。

“软”和“乱”使得一些部门行政执法的随意性较大,未能及时履行职权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个别被查封的违规企业偷偷生产、排污,威胁周围百姓身体健康;一些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

员,靠背行政机关这棵“大树”,粗暴执法,引发冲突。

有鉴于此,一部统一的规范行政强制的法律呼之欲出。然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之路并不顺畅,从1999年开始起草工作至今已有10年。2007年第二次审议时,仍有代表主张暂缓立法,认为行政机关的权力已然相当大了,再专门出台法律无疑是赋予其更多权力。

这反映了人们对某些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不满和担忧,同时反映出一部分人对行政强制立法目的和内容的不尽了解。表面看来,立法的确是在授予权力,但这些都是行政机关一直享有的,并且在行使的,只是散

见于不同法律法规,没有统一到一部法典中。因此,行政强制法的授权并不意味着扩权,更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为了限权,为了将行政强制的措施严格限定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并且按照法定程序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强制法实际上是给公权力机关戴上了“紧箍”,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目的是保障私权利的实现。

综观此次三审稿新增的诸多规定,皆渗透着“紧箍”的作用。比如,草案增加了设定行政强制的事前论证和实施中的评估论证,这对于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冲动和设定行

政强制措施随意性,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意义重大;草案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由具备资格的正式执法人员实施,这有利于提高执法质量,也从制度上避免了一出事便将责任推给“临时工”的情况;草案从程序上加强了对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查封扣押生活必需品,不得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等,同样是给执法者提要求,迫使其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当然,关于这项法律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少用、慎用、善用行政强制,则是人们所认同的立法理念。毕竟,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必须慎而又慎。

新闻观察

□张培元

图说

□徐进/画



“骄子”

据《新快报》报道,南宁的一位王姓家长为十几岁的儿子举行生日宴,酒店门口一个大气球拱门、20多个升空大气球各挂着10多米长的竖幅,众多有名气的单位和个人祝贺。

生日宴够气派,孩子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试想一下,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虚荣和摆阔的环境中,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和抗挫折能力从何谈起?家长们应该三思。

如何才能让马局长“不脸红”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出现了经济增速和发电量的不匹配,为此该局先后6次在全国网站作出回应。之后不久,一份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工资单,又引来网民对工资“被增长”的热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网民的意见自己看了也脸红。(见8月24日《扬子晚报》)

众多网民深感工资“被增长”,个人收入并不像统计报表里的数字那样光鲜。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统计数据失真、统计方法的缺陷。作为统计部门最高行政首长,马建堂坦率面对媒体,主动剖析不足,也算难得。

统计数据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是国家进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公众了解国情国力、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信息来源。由此可见,深受社会诟病的工资“被增长”现象,并非统计工作中的小瑕疵,而是一个大问题。它用数字泡沫堆起的收入幻象,引发公众质疑,对统计公信力产生损伤。

将统计数字挤干水分,“不出假数”,“真实可信”,应是各级统计部门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换言之,只有让绝大多数人感到统计数据客观、真实地描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乃至普通大众的生存生活状态,公众疑虑方能消解,统计信用与社会信任才能恢

复,马局长们才会中气十足,避免“看了脸红”的尴尬。

根据马局长的分析,网民之所以感到工资“被增长”,是因为工资统计覆盖范围确实窄了。现在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个体企业越来越多,自主创业、临时就业、阶段性就业、弹性就业群体日渐庞大,农民工队伍总量更是达几亿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国企职工。在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统计体系,只照顾到了机

观点新闻

□阿黄

降幅不明显

●新闻——
全国查处酒后驾驶专项行动一周,共查处醉酒驾驶机动车2000多起——据报道,公安部交管局承认,“酒后驾驶机动车为特别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降幅不明显”。

●观点——
这样一种状况无疑令人心忧。究其原因,无非是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以及惩罚力度不够所致。治理酒驾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有若干共性,首先就是立法上从严,其次是实行教育常态化。对此,我们不妨予以借鉴。

关白领、国企及集体企业人员,忽视了非公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从业者,众多收入较低且不够稳定的草根从业者皆游离于统计之外。以仅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及国有、集体企业员工的“口径”,以概全地统计“全国城镇职工”收入,所得结果肯定与现实相差甚远,产生工资收入虚高的泡沫在所难免。

如何才能让马局长“不脸红”?必须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算准百姓钱袋子,细化统计报

表,分地域、分行业、分部门进行统计,将各类企业以及包括街头摊贩在内的各个就业群体完整涵盖于内。

在实现全景统计和全方位统计之前,不妨先把“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名目,换个严谨准确的名称,即“全国部分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名至实归,人们方不致产生“工资被增长”、“生活被富裕”、“幸福被提高”的荒诞之感。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了几年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和问题,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摆在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5年底起,为准备党的八大报告,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

的讲话中,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对于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十大关系论述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

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

十大关系着重从经济工作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开始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

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在讨论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处理国内矛盾方面,重申延安以来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赞成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提出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方针,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新中国档案

离岗不离党 退休不褪色 出国不出格

——军事科学院第二干休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军事科学院第二干休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重要内容,引导老干部始终保持革命理想信念,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出国不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军事科学院第二干休所是全国全军学雷锋先进单位,全军干休所管理先进单位,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曾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所党委对全所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反思,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引导老干部始终保持革命理想信念,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离岗不离党,信念忠贞不渝。78岁的高休干部部有盛,情系军队建设,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教育活动。一次,他正准备应约去解放军301医院住院,当得知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小组会,便推迟几个小时,参加党小组学习讨论之后才去就医。82岁高龄的高休干部

于若平,积极撰写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体会文章,分析研究当前社会问题,批驳一些错误思潮,引导身边同志坚定对党的信念。退休不褪色,保持科研情怀。这个所老干部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发表学术文章308篇,出版著作33部。离休10多年的著名国际军事学专家王振西,研究重大军事战略问题,撰写和翻译军事学论文48篇,出版专著1部,翻译外国军事专著和其他著作29部,共计1100多万字。

出国不出格,严守组织纪律。这个干休所

先后有40多名老干部出国(境)探亲 and 旅游,每个人都积极维护祖国尊严和我军形象。离休干部陈鲁生的2个儿子分别定居在美国和加拿大。他和夫人去美国看望大儿子,严格按照出国要求,多次拒绝小儿子邀请去加拿大的请求,让小儿子去美国得以全家团聚。这些老干部出国不但严守组织纪律,还教育子女要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更要注意维护祖国的尊严。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首届“中国阳光传媒”在京揭晓

本报讯(记者王瑜)8月23日,首届“阳光保险杯”中国阳光传媒推选活动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程惠生等出席并为获奖媒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和证书。

本次“中国阳光传媒”推选活动评选出南方日报社、广州日报社、北京青年报社等10家“中国阳光传媒单位”,南方传媒集团董事杨兴锋、上海文广新闻传媒总裁黎瑞刚等10位“中国阳光传媒领导者”和20位“中国阳光记者”。

(上接第1版)经过长期努力,五个自治区变化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各族群众得到的实惠之多,前所未有,举世瞩目。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成功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团结状况是良好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杜青林出席了开幕式。

此次展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共同主办。展览通过图片、文字、影视展播和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充分介绍和展示了我国五个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用事实说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进步,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海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纪实图片展》同时开展。展览将于9月17日结束。

杨子荣



长篇小说和同名电影《林海雪原》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是根据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区第2团在深山老林剿匪的真人真事塑造的英雄形象。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来到安东(今丹东)一带。在父亲病死他乡之后,杨子荣只身一人四处讨生活,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土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这些生活经历,对他后来的剿匪斗争中的侦察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的压迫,被迫跑回山东老家。

1945年9月,杨子荣参加八路军,任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第5中队炊事班炊事员。同年10月随部队开赴东北,被编入牡丹江军区第2团第7连。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任第7连第1班班长。不久,牡丹江军区开展剿匪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杨子荣只身闯入土匪盘据的杏树底村,与匪首巧妙周旋,不费一枪一弹使土匪400余人投降,缴获机枪10挺、火药3万、掷弹筒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药。由于在战斗中的突

出表现,他荣立特等功,并被团里评为战斗英雄。不久调到团部任侦察班班长,后提升为侦察排排长。在此期间,杨子荣关心战士疾苦,深得大家爱戴和拥护。他带领战友们在穆稔、东宁等地多次参加剿匪战斗,每次都身先士卒,勇敢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留下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7年1月下旬,团部得到匪首“座山雕”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座山雕”本名张乐山,15岁落草为寇,18岁当上匪首,历经清末、张作霖和伪满洲国3个时期,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东北民主联军进驻牡丹江地区后,对这股土匪进行了多次围剿,消灭了大部人马,“座山雕”身边仅剩二三十个亲信。杨子荣自告奋勇,带领5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他们到达皮沟附近的密林后,巧妙地与“座山雕”的探报接触,经过用黑话联络,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匪穴。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李义堂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创造了剿匪战斗中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为此,团里给他记了三大功。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

2月23日,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由于他的枪栓被严寒冻住而未能打响,被土匪的手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时年30岁。3月17日,全国指战员、驻地群众、军区首长、地方领导和各界代表上千人齐聚朝鲜族小学操场,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8个大字:“英雄永在,浩气长存。”为表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等事情。李辉说:“从流落街头到现在生活在温暖的家中,爸爸给了我很多,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其他的同伴多做点事情。我将未来成为像爸爸一样有用的好人,继承他的事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李文哲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等殊荣,但他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略带疲倦的他看着身边的孩子们和家中最显眼位置摆放着的一张张孩子们的照片,倍感欣慰。(据新华社长春8月25日电)

他用瘦削的双肩扛起了自己的“希望工程”

越来越多的孩子,李文哲2001年购买了这处旧厂房,把它改造成了福利院,并配备了厨房、餐厅、健身房、卫生间等设施。现住在这里的30个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8岁。每当李文哲走到孩子们中间,各种称谓经常成为院子里的一支交响曲:爸爸、大爷、爷爷……“让每个孩子托起希望过日子”,这是李文哲常说的一句话。凭着这样的信念,李文哲把帮助孤寡少年儿童当作了自己神圣的职责

和应尽的义务。“孩子们还小,有的10岁上下,吃喝拉撒都得操心,尤其是学习和举止行为更得留意,这关系到孩子们成长的问题,一丁点儿也马虎不得。”李文哲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2点多才能休息。“睡觉都得睁只眼”,他这30多年真的一天也没有轻松过。李文哲现在是在延边监狱的义务帮教员,帮助教育了很多问题少年。2004年,一个不记得自己生日的孤儿来到李文哲家中,流浪生

活让他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他初到时报习难改,同伴都很反感他。李文哲的儿子非要把他赶走。李文哲做通了儿子的工作后对这个孩子说:“你没有家,没有亲人,现在我家就是家。你确实需要钱,可以跟我要,偷钱绝对是不对的。”在李文哲的教育鼓励下,这个孩子逐渐改掉了坏毛病,并改名为李辉,把户口也落到了李文哲的名下。如今,李辉已经能够协助李文哲做采购

祖国大家庭